

书为作者多年对哲学、史学研读成果。内容涉及西方文化哲学、西方经济学，包括重商主义、重农学派经济思想及理论；配第、洛克、马西、诺思、边沁等经济学说；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确立和发展；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说；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学说；凯恩斯的经济学说；福利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萨缪尔森综合经济学；中国明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

读史泛言

——读西方文化哲学、经济学和
中国史学札记

沈守愚 著

读史之言

沈守愚

著



【 —— 读西方文化
哲学、经济学和
中国史学札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读史泛言：读西方文化哲学、经济学和中国史学札记 /
沈守愚著.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6
ISBN 978-7-109-12640-4

I. 读… II. 沈… III. ①文化哲学-研究-西方国家
②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研究 ③史学史-研究-中国
IV. G02 F091.3 K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63412 号

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北路 2 号)
(邮政编码 100125)
责任编辑 姚 红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2008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20mm×960mm 1/16 印张：18.25
字数：300 千字 印数：1~1 000 册
定价：36.00 元

(凡本版图书出现印刷、装订错误，请向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PDG

[作者简介]

沈守愚，杭州市萧山人。1919年生，1943—1947年毕业于重庆国立中央大学政治学系。1948年3月经考试院高等文官考试及格，铨叙为荐任职，任用于民国政府财政部荐任稽核。民革党员。1946年参加重庆“一·二五”学生运动，同年2月6日听取周恩来长达七小时的关于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报告。2月10日参加重庆校场口庆祝政协胜利大会时因暴徒滋事，李公朴被殴，我们救护他和郭沫若、马寅初出围并送白沙医院。1947年参加南京“五·二十”学生运动。解放初1949年5月正式参加革命工作。历任南农大秘书、讲师、副教授、教授。主编农业部指令性教材《农业经济法》，国家土地局《土地法学》、《土地大辞典》、专著《土地法学通论》等书。

序言

记得5年前我曾经向我院学生刊物推荐过南开大学卫志民老师题为“梅花桩与照妖镜——和大学生朋友们谈谈经济学和经济学界”的文章。在文章的开头部分，卫老师建议准备献身于学术研究的青年学子“要有意识地去构建一个相对完整的经济学理论知识框架，作为核心的知识系统，在它的外围还要存在一个以文、史、哲知识为主，以自然科学知识为辅的外围知识系统，二者合而为一才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知识结构”。针对时间有限和信息爆炸的矛盾，卫老师建议多读经典著作和译著，既可以择精，又可以减少自己选择的时间，提高读书效率。

我非常赞同卫老师的主张。我现在的研究工作就得益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特别是十年插队时期非功利性的自由阅读，尤其是对照性地阅读经典著作。比如，在系统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经济论著（包括《资本论》）的同时阅读斯密、李嘉图和魁奈以及当代西方经济学著作；在阅读米丘林和李森科的同时阅读孟德尔、摩尔根、达尔文和现代遗传学、生物学及农业生产知识；在“批林批孔”的高潮中从《韩非子》读到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和人类学家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同时也涉猎老庄、荀子和康德、费尔巴哈、黑格尔，等等。我始终认为，任何一门科学的哲学和逻辑基础最充分地体现在开创者的经典著作里；后

来的大师在学术上的发展建立在经典著作的哲学和逻辑基础之上，他们的著作通常假定读者与作者一样已经掌握了这些哲学和逻辑基础而不再重复。可惜的是，并非所有的读者都具备这样的基础；特别是在浮躁冲动的氛围中，青年学子更倾向于迫不及待地跟上最新前沿，早出成果、快出成果，因而往往把自己的未来建立在不稳固的基础甚至是沙滩上。

1952年的大学院系调整是导致我国经济学学子知识系统不完全的一个重要体制因素。尤其是理工农医类院校，在失去一般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支撑以后，一些部门经济学或者少数几个经济学专业分支的教学科研不仅不足以培养真正的理论创新人才，而且很可能误导青年学子，让他们误以为现行的课程结构已经足够成为今后的发展基础。有感于此，沈守愚老师在行将年满九十之际整理、撰写了这本读书札记，从个人的切身体会出发，对经济学研究可能涉及的种种知识进行了初步梳理，以期对青年学子理解经济学研究所需要的知识结构以及这些知识的发展脉络有所裨益。我相信，任何一个理解沈老师苦心的青年学子都能从中找到对自己进一步有目的寻找和阅读经典著作以形成完整知识结构有益的启示。虽然我们现在根本不能奢望青年学子有大量的时间用于非功利性的自由阅读，但是，如果下决心走严肃地的学术研究之路，就必须作出痛苦的选择，舍弃一些当前的利益和所谓机会，为自己的长远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沈老早年毕业于中央大学，改革开放以后在南京农业大学从事与农业经济有关的教学科研工作，特别专攻土地法。退休后沈老仍然担任国土资源部的法律顾问，同时笔耕不辍。在85岁高龄时沈老出版了80万字的《土地法通论》，书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提出和建立了从宪法到地方行政法规的完整的土地法体系，这种综合的能力凸现了知识体系的重要性。在《土地法通论》出版以后，沈老曾计划撰写一部土地文化史，并建议我与他合作。我对沈老的建议非常

感兴趣，但终因难以抽出足够的时间不得不作罢，也因此感到愧对沈老。令我欣慰的是沈老不仅充分体谅我的苦衷，而且很快独自完成了一部新作，以过来人的身份对青年学子提出建立和完善自身知识结构的建议。

对于青年读者我只有一个建议，即以对照的方式阅读不同观点的经典原著需要批判的头脑，需要在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综合的能力；简单罗列和“收藏”不同流派的学说，只能将自己的大脑变为储藏室，甚至更糟糕，因死搬硬套而变宝为废，将自己的大脑变为垃圾箱或垃圾产生器。

对沈老我也有一个衷心地祝愿，愿他继续保持健康的身体和清醒的头脑，继续为我们提供更多的知识、经验和建议。最后，我引鲁迅两句话：“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年”结束并共勉。是为序。

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钟甫宁

2008年8月2日

[写在前面]

“文革”之后，中国高等教育经历了许多变化。本文将从高等教育的学科设置、教学方法、教材选择等方面入手，分析这些变化的原因，并探讨其对高等教育发展的影响。

首先，学科设置方面发生了显著变化。过去以工农兵为主要培养对象的工科专业逐渐减少，人文社科类专业得到大力发展。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许多新兴学科如管理学、法学等也相继设立。其次，在教学方法上，传统的灌输式教学逐渐被启发式、讨论式等更加灵活多样的方法所取代。教材选择上，过去单一的马克思主义教材逐渐被多元化的教材所替代，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学习内容。此外，教育理念也发生了变化，强调以人为本，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

然而，尽管取得了一些成绩，但高等教育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例如，部分高校的教学质量参差不齐，部分专业的设置与社会需求脱节，部分教师的教学态度不够认真等。这些问题需要引起重视并加以解决。

总的来说，“文革”之后的中国高等教育在学科设置、教学方法、教材选择等方面发生了深刻变化，取得了显著成就，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未来，高等教育应继续深化改革，提高教学质量，满足社会需求，培养更多优秀人才。

和本书所依的缘由之一。

我在 1943—1947 年就读于重庆国立中央大学政治学系的。《读史泛言》仅为个人学习笔记，所以未必尽然。由于记述涉及西方文化哲学、经济学、中国史学内容，或可供一般参考。兹将个人过去就读学校、系科、学习经过作一简介。

国立中央大学有文理工农法医商师范 8 个学院，前身是南京高等师范和东南大学。肇基于南京成贤街。校长郭秉文以“科学无国界”，面向世界办学。1922 年美国孟禄博士来华考察教育，认为“东南大学是中国最有希望之大学，可与英国牛津、剑桥相颉颃。”同年德国哲学家杜里舒博士即留东大讲授《生机哲学》、《哲学史》、《欧美哲学思潮》等课。美国依利诺大学即在东大内设上海商科大学，后为中大上海商学院之始。美国哈佛、麻省二学校与东大签订《中美合办工科大学计划》：中方承担基地校舍，美方承担经常费 7.5 万美元，并由美方出资 100 万美元扩充东大工科，专业教员由美方委派。1917 年郭秉文任欧洲及美国教学考察团主任，率团考察英、美、法、德、意、瑞士、日本等国高等教育。1923 年郭以中国首席教育代表参加世界第一次教育会议，在 60 多个国家 300 多名代表中当选为世界教育会副会长兼亚洲分会会长。1928 年东南大学改名为中央大学，由朱家骅为校长。1932 年由罗家伦为校长。罗氏是“五四”运动学生领袖，留学英、美、法、德，回国后先任清华大学校长，继来南京接任中大校长。1936 年他因成贤街校址无扩展余地，建议迁校城南菊花台。是年 11 月民国政府批准迁校，下拨迁校费 8 万银元。是时中日关系恶化，罗氏高瞻远瞩，决定将该款改为迁往重庆沙坪坝建校之用。为了争取时间能于 1937 年秋在重庆开学，即将全校师生、家属、图书仪器，以及农牧场牛羊等，水陆并进于 1937 年上半年全部平安迁至沙坪坝松林坡。正当中大完成迁校之时，日寇发动侵略战争。清华、北大、南开、浙大、武大、交大迫于形势匆忙一迁再迁，而中大此时已在重庆平安开学。

1939年1月至1941年7月，日寇以3495架次飞机轰炸重庆，炸毁民房5793幢，死伤平民6896人。中央大学远在郊外，安然弦歌不辍，诚如罗氏诗曰：“嘉隆江上开新局，劫火频摧气益遒，更喜牛羊明顺逆，也甘游牧到渝州”。1941年秋日占缅、侵昆、攻渝，民国政府特任罗氏为黔滇考察团团长向龙云说项抗日。后继任印度大使、联印抗日。校务由顾孟馀、吴有训二氏先后继任。顾、吴两氏在郭、罗辟划基础上延聘国内外名流50余人来校任教^[1]，进一步加强科学的研究和教学，使当时中央大学成为名冠全国的最高学府。是时学术界的精英咸来中大，文化界人士有郭沫若、茅盾、傅孟真、叶圣陶、老舍、曹禺、冰心、陈西滢、白杨、戴爱莲、林语堂、何浩若、孙越崎等多人。他们或来作学术报告、或来开座谈会、或来作慰问演出。如林语堂长期侨居国外，此次为表示对祖国的热爱，亦来中大讲学，并将其出版“四书”的译稿费捐购飞机献给国家。冰心连续三天作“西厢记研究”讲座，讲时每首词都边背边讲，文学功底之深令人叹服。曹禺亲给我们学生话剧社导演《雷雨》、《日出》、《万世师表》、《清宫外史》、《桃李满天下》等话剧。在工程师年会上孙越崎讲玉门油矿开采的艰难和新疆地区的石油矿结构。应天文系邀请的法国天文学家历时5天讲述宇宙行星。历任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20余年的社会法学派创始人庞德教授亦来中大兼教授和教育部顾问，并为我们学生开课。各院系在民主墙上公告的学术报告每日都有，真是人文荟萃，学竞自由。解放后衍生为南大、东大、华水、南师、南农、南林、南化、华东航大、第四军医大。百年校庆时江苏省铸九鼎分赠纪念。

我受业时政治学系开设22~24门必修课^[2]。系主任黄君白先生系伦敦政治经济研究院博士，曾应美国国务院邀访，并出席美、德、法、瑞、印、日等国召开的各项国际学术会议，著作等身，在国外出版的书多于国内出版。并任民国政府大法官。教经济学课的夏炎德老师亦伦敦经济研究院出身，他以流畅的英语偶夹中文讲学，讲

马克思经济学时，因国内尚无中译本，板书全为英文。听他课后，我们读原文参考书比较容易。另一位讲授经济学的教授是吴斐丹先生，他译著很多，《魁奈经济学》（商务印书馆版）是他的译作，他讲课论述严谨，系统性强，重点突出，容易记忆。讲授国际法和外交史的是王铁崖老师，王老师在伦敦政治经济研究院五年，是世界著名的国际法研究院院士、海牙国际常设仲裁法院仲裁员。他授课均按他自己积累的厚重资料讲授，材料实，内容新，并以他搜集的国内外实例相印证，使人获益良深。

在学以致用方面有一例。国家货币发行量大引起物价波动，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认为要紧缩货币发行量，提出抛售黄金使货币回笼。而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叶元龙先生则提出相反意见，认为中国战时工商业所占比重不大，货币回笼促使银根抽紧，不利于战时工商业发展；何况中国当时仍为农业国，货币量稍大与农村经济无影响，且有利于活跃城乡经济。政府经过考虑，为防患未然，接受了马氏意见，抛售了黄金 20 吨，物价即趋稳定。这件事与名噪一时的凯恩斯“供给创造需求”的理论观点不合。凯恩斯认为用人为力量刺激投资和消费便可以扩大就业和需求，缓和经济危机。凯氏的观点是建立在需求不足上。他认为货币是流动性最大的财富，对策不在抽紧银根，而在改变货币准备金，调整利率，管理银行存款等环节上。对于凯氏的观点，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不以为然。弗里德曼认为：通货膨胀的原因来自政府开支过大；就业不充分；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失当。解决之道首在节约政府开支，使国家有控制力所能及的货币量。弗里德曼的经济观点在美国是颇具影响力的。上述四种观点我们认为弗里德曼的易于执行且符合实际。由是可见，记述各种经济学说是有利于比较应用。

史学是记载历史事实，贵在真实。只有真实，才能明辨。唐代魏征死，李世民叹曰：“以史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死朕失去了一面镜子。”足见记述历史事实十分重要。司马迁作《史记》秉笔直书，

成为史学翘楚。然司马迁整理古史以“雅驯”为标准，言“雅驯”，始著录，“否则不取。”“神奇怪诞”之说不合“雅驯”而《史记》不录，则上古史中各项记载失去查考依据。上世纪初史学大家顾颉刚先生以数百万字的两册巨著《古史辨》，认为时代愈后，传说古史愈长的假定，悉心考证古史，确立疑古的意见，认为上古史是由周秦时代人伪造的。这未免是武断。

司、顾两氏均以古籍为依据，疑者不录，在方法上是主观唯心主义，不足为据自亦显然。20世纪60年代中国科学院核物理研究所仇士华院士创建核物理碳14测定研究室，通过核物理分析研究测定上古史各种年代，开辟了古代史实研究新纪元。仇氏举例：武克商建立周代政权的正确年代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尽毕生之力提出了40多种意见，但众说纷纭：他运用核物理碳14测定为公元前1036年。这个年代先是从世界冰柱研究者测出中国一次火山爆发时间段，后又测定是长白山那次火山爆发，后又从长白山喷发岩熔浆木材碳化测定显示是公元前1036—前1050年，后测定武克商事件发生地碳14显示正确年限是公元前1036年，于是召开有数十位历史学家、地质学家参加会议分析讨论，从原有40多种意见研究，大家一致同意为公元前1036年，其最大差异为13年。运用这种方法测定中国伏羲氏建国年代为公元前5340年。本书“大地书史”和“中华民族文化的发端”两节即是以此为依据的。关于书中引用沃尔弗歌颂中国伏羲氏和三皇五帝以及孔子是中国智慧复兴者和传播者的话不是主观臆想。而是欧洲17~18世纪文艺复兴之后反神权和封建主义思想文化大解放的革新运动的倡导。沃尔弗生活于1679—1754年，正是中国清朝康熙四十八年至乾隆二十年间，是编写《康熙字典》、开博学鸿词科，推广程朱的孔孟学说，编写《文献通考》和《皇朝文献通考》，开《四库全书》馆的时期。同时沃尔弗是俄国彼得大帝的科学顾问，康熙二十八年（1689）中俄签订的《尼布楚条约》，这是中国外交上唯一胜利的一个条约，由曾国藩儿子曾纪泽出使签订，也表明中国当时

国家强盛。沃尔弗所讲的三皇五帝从碳 14 的测定是真实的。他所宣扬的中国人的道德风尚是理性的，不是臆想的。

本书所描述的西方经济学说是我学习经济学时的初衷。2005 年 12 月 24 日南京《现代快报》报道香港经济学家郎咸平在清华大学说公平，这则新闻是促成我写的动因。郎氏在报告第一段说“先富决不能让另一部分人更穷”，随后又从《国富论》的作者亚当·斯密，说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完成者李嘉图，从马克思的《资本论》说到福利经济学，郎咸平告诉人们：“社会不能也无法容忍不公正”。郎氏报告最后说，“《资本论》推动了社会公平的巨大进步，而共产主义理想本身就是对公平的一种追求”。我无缘亲聆郎氏的报告，报纸也没有更多的转载。鉴于改革开放前，我们对资产阶级经济学说一概加以否定。马克思、恩格斯都共同悉心研究了古典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说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也是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本着这一认识，我非常赞同郎氏报告的结语，并以这一结语借作本书关于西方经济学说及其他结语，今将付梓，不当之处必多，望读者指正并鉴谅。

本书初稿由我校学报社科部陈友松常务副总编审阅，并提出宝贵意见修改后，经中国农业出版社正式出版，谨此致谢。

注 [1] 其时来校任教的有：柳诒徵、陶行知、竺可桢、赛珍珠、庞德、马寅初、陈衡哲、楼光来、戴修瓒、黄季刚、曾昭伦、孙本文、胡小石、吕叔湘、茅以新、柳无忌、宗白华、吕凤子、徐悲鸿、李剑晨、陈之佛、潘玉良、黄汲清、郭任远、涂长望、刘树熏、杨廷宝、严恺、陈大燮、陈康、金善宝、王铁崖、韩儒林、陈振汉、陈鹤琴、赵忠尧、欧阳翥、胡焕庸、吴瞿安、徐克勤、潘菽、吴恩裕、张土一、郭秉文、缪凤林、史尚宽、杨兆龙、浦薛凤、徐仲年、罗根泽、胡先骕、肖孝嵘等。

注 [2] 政治学系开设课程有：哲学概论、逻辑学（形式逻辑、辩证逻辑、数理逻辑）、通史（中国通史、西洋通史）、政治学、经济学、民法、刑法、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宪法、行政法、行政学、各国政府、中国外交史、西洋外交史、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经济思想史、西洋经济思想史、西洋政治思想史等 22 门，选修课由学生自由选听。



- 序言 1
写在前面 1
第一编 西方文化哲学 1

一、人文主义的哲学理念	1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	14
三、经济增长论的误导	16
四、后现代性以人为中心时期	19
五、构建和谐社会开创人类社会新纪元	23

第二编 西方经济学

一、重商主义经济思想及其理论	27
二、重农学派的经济思想及其理论	33
三、配第、洛克、马西、诺思、边沁等经济学家的主要学说	42
四、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确立与发展	53
五、亚当·斯密的《国富论》	59
六、李嘉图的经济学说	74
七、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说	81
八、历史学派、边际效用学派、新古典派的经济学说	92
九、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学说	108
十、凯恩斯的经济学说	139
十一、福利经济学	147
十二、新制度经济学	155

十三、萨缪尔森的新古典学派综合经济学 166

第三编 中国史学

一、中华民族的肇始.....	173
二、中华民族文化的发端	181
三、继承民族传统 发扬理性精神.....	189
四、中国传统的人生哲学——从儒学、道学到儒、道、佛学合流	196
五、中国历史上的重农思想和政策	211
六、中国明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	226
七、中国近代进步哲学思潮及辛亥革命、五四运动	228
八、台湾各民族根在祖国大陆，领土主权永为中国	243
九、中日关系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253
十、走向和谐社会献言	268
参考文献	274

第四编 文化与社会

一、中国哲学家对人生意义的探讨	1
二、中国哲学家对人生价值的探讨	2
三、中国哲学家对人生理想的探讨	3
四、中国哲学家对人生智慧的探讨	4
五、中国哲学家对人生道德的探讨	5
六、中国哲学家对人生艺术的探讨	6
七、中国哲学家对人生政治的探讨	7
八、中国哲学家对人生宗教的探讨	8
九、中国哲学家对人生自然的探讨	9
十、中国哲学家对人生社会的探讨	10
十一、中国哲学家对人生历史的探讨	11
十二、中国哲学家对人生哲学的探讨	12
十三、中国哲学家对人生美学的探讨	13
十四、中国哲学家对人生政治学的探讨	14
十五、中国哲学家对人生经济学的探讨	15
十六、中国哲学家对人生社会学的探讨	16
十七、中国哲学家对人生心理学的探讨	17
十八、中国哲学家对人生伦理学的探讨	18
十九、中国哲学家对人生逻辑学的探讨	19
二十、中国哲学家对人生辩证法的探讨	20
二十一、中国哲学家对人生形而上学的探讨	21

第一编

西方文化哲学

一、人文主义的哲学理念

(一) 文艺复兴时期

西方人文主义的哲学理念始于文艺复兴。文艺复兴以前，欧洲中世纪是“原罪说”、“上帝高于一切”、“禁欲主义”等神学思想体系统治人们的精神世界。教会为捍卫宗教，把宗教教条奉为绝对真理。“经院哲学”家、意大利人安塞姆（1033—1109），移居英国的神父，他成为“经院哲学”的奠基人。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作为经院主义哲学家长期在教皇宫廷讲授神学，著《神学大全》把法律思想集中表现在神学中，把经院哲学进一步系统化，他把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著作肆意篡改，使其与基督教神学结合起来，构成西欧中世纪具有法律效力的神学法律思想，为封建世俗统治的教会效劳，把唯心哲学同圣经的说教相结合。列宁指出：“僧侣主义扼杀了亚里士多德学说中活生生的东西，使其中僵死的东西万古不朽。”^① 恩格斯指出：“教会显贵本身就是封建主，他们拥有全欧洲 1/3 地产，除了使用暴力外，一切宗教上的诡计都施用了。……教会把榨取什一税、贩卖赎罪券、伪造圣像和圣徒遗物，及驱逐出教和拒绝赦罪的威吓作为惯伎。教会的触角伸向各处，在政治、经济和

^①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 38 卷，P415。

生活各个领域禁锢了人民的思想，宣扬‘上帝就是一切’，不准探讨科学知识。”^① 阿奎那还提出法是对公共幸福事项的合理安排的神学概念，使法律将自然法、神学、人定法构成一个等级，成为是上帝支配整个宇宙的永恒法。

文艺复兴（Renaissance）是欧洲在教皇封建统治的黑暗时代唤醒人们觉醒的伟大运动，原义是“再生”。中古时代欧洲的政教学术，先为日耳曼族所摧残，继为基督教会所压抑，以至过去灿烂的希腊、罗马文化几乎完全被消灭。及至希腊学者避难意大利因讲授古典文化而于 11 世纪开始研究倡导，使其文艺复兴。文艺复兴之名，则于 1550 年意大利画家、艺术史家乔治·瓦萨里（1511—1571）在佛罗伦萨所写的《意大利的建筑、绘画、雕塑大师列传》中第一次出现其名称。^② 18 世纪中叶，法国启蒙学者伏尔泰（1694—1778）开始把文艺复兴作为一个新的文化来对待。19 世纪中叶，法国著名历史学家米席列、英国的西蒙士、瑞士的布克哈特等开始明确阐述文艺复兴的概念。它是指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恩格斯研究这段历史进一步指出：“文艺复兴时代指的是从中世纪的文化向近代文化过渡的时期。”这是一次伟大的变革，是新兴资产阶级在哲学、文学、宗教、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开展的一场革命运动。文艺复兴在意大利是 14—16 世纪，在欧洲其他国家是 15—17 世纪。因为莎士比亚、塞万提斯等的许多名著都是 17 世纪问世的，所以恩格斯称文艺复兴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那时，差不多没有一个著名人物不曾作过长途的旅行，不会说四五种语言，不在几个专业上放射出光芒。”^③

文艺复兴可分早期、中期、晚期三个时期。早期是在文学领域最先发起冲锋，揭开教会黑幕，以人文主义文学出现为开端，在各国以新的造型艺术和建筑艺术为特征。首义者为意大利诗人但丁（1265—1321），他对希腊、罗马文化很有研究，以奔走国事不为所容而流浪外乡，作长诗《神曲》。诗中记其梦游三界（地狱界、净罪界、天国）。用隐喻笔法大胆谴责买卖圣职的教皇和僧

^①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7 卷，P391。

^② 《大英百科全书》第 15 卷，伦敦 1974 年第 15 版，P660。

^③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P445。